

東方巨人 毛澤東

DAON DUN
DAON DUN

敢叫日月換新天



希望文库·红色文丛·东方巨人毛泽东

敢叫日月换新天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奇铁英

封面设计:顾 涛

希望文库—红色文丛—东方巨人毛泽东 敢叫日月换新天

主 编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
出 版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 010010
发 行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朝教印刷厂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680
字 数 4800 千
印 数 5000
标准书号 7—80723—006—1/I·4
总 定 价 1500.00 元
定 价 20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前　　言

毛泽东，字润之，笔名子任。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。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。中国人民的领袖，马克思主义者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和理论家，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，诗人，书法家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（1936～1976）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（1943～1945）和中央委员会主席（1945～1976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（1949～1954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（1954～1959）。

早期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的新军。1913～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。1919年在长沙创办《湘江评论》。1920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。同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。1921年7月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，领导长沙、安源等地工

人运动。

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 1923 年 6 月，毛泽东出席中共三大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。1924 年参与中共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。在国民党一大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，任宣传部代理部长。1926 年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。11 月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。1927 年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。

建立革命武装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，中共中央于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著名论断，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。

毛泽东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、霸权主义，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，维护世界和平。就他一生来看，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，远远大于他的过失，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高尊敬。1981 年 6 月，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、公正、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。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，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，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编 者

目 录

毛泽东眼里的“毛泽东”	(1)
1. 青年时期：“性不好束缚”。表面“意强”、实际 “意弱”	(2)
2. 红军时期：谈陈独秀和自己。为什么向斯诺敞 开心扉？	(8)
3. 延安整风前后：面对夸赞。“你以什么权力在这 里指导政府和军队？”	(14)
4. 40 到 50 年代：“我的思想体系没有成熟，这不 是谦虚，事实如此”	(20)
5. 50 年代前期：搞个人迷信不好	(28)
6. 50 年代：请斯大林派人“来看我的文章？是不 是我那样没有信心？”	(32)
7. 50 年代后期：不当国家主席，“个人威信不会有 所减损”	(38)
8. 大跃进及其以后：经济工作“不懂”，“这一辈子 搞不了了”	(44)
9. 庐山会议及其以后（一）：“偏听偏信，就是要偏”， “领袖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”	(51)

东方巨人毛泽东

10. 庐山会议及其以后(二):回顾历史,“人没有压 力是不会进步的”	(56)
11. 60年代:肯尼迪“也看致写的军事文章,这可 能是真的”	(60)
12. 60年代中期以后:“总要有点个人崇拜”。 “做了共产党的钟馗了”	(63)
在逆境中	(73)
不摸枪的统帅	(90)
心灵的旗帜	(104)
1.“我不信邪,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”	(104)
2.要干到底:“以身殉志,不亦伟乎?”	(114)
3.用四个字支撑一条路	(120)
4.什么能使他变得年轻?	(133)
读书与治国	(149)
1.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	(151)
2.一本书和两场运动	(162)
3.三本书的政治畅想	(176)
4.两本书反思大跃进	(191)
不怕“鬼”的背后	(198)
1.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说“鬼”?	(198)
2.多事之秋在四方电讯上的批示	(205)
3.“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书”	(209)
4.打鬼:庐山会议上有人替毛泽东“找到了几	

梁山泊好汉传

挺机关枪”	(215)
5.“我也六十多了，就是不怕鬼”	(221)
出将入相——喜欢和鄙薄的“干部”典型	(233)
1. 两个好典型：“多谋善断”的郭嘉，“劳谦”仁厚的韦睿	(234)
2. 两个不成大器的“主公”：“多端寡要”的袁绍，“虚有其表”的刘表	(240)
3. 四个坏典型：“无行”的郭象，“庸人”王建，“笑里藏刀”的李义	(246)

毛泽东眼里的“毛泽东”

谈论领袖人物的性格，挖掘他的内心世界，当然要依据他的所言所行，借助他做事做人的外在表现及其客观效果。有距离，可以客观些，但也常常难免隔雾看花。有时候，如果从他们自我解剖的话里话外来分析，可能会弥补隔雾看花的不足。而成就了大业，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伟大非凡的人物，一生的历程从来都曲折起伏。在他们艰难跋涉或顺达开怀的时候，常常伴随有灵魂的独自漫语，伴随着真诚的自我解剖。此类反思心迹，多少是他们得以成功并且伟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助力。

一个人在自己的坎坎坷坷的经历中，怎么会没有灵魂的独白、情感的波涛和真实的反思呢？没有这些而让人尊重的伟人，还真没见过。毛泽东很推崇鲁迅，说过这样的话：我喜欢他的坦率，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，在跌了几跤之后，我也往往如此，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。匆匆几十年过去了。带着人们不相信他的自我解剖的遗憾，毛泽东也撇 20 年了。

现在无疑是该信的时候了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伟人的自我解剖，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。有时未免谦逊，有时未免责己过严，有时则是出于微妙的政治需要……于是，毛泽东眼里的那个毛泽东，自然就是打引号的了。

1. 青年财忧：“性不好束缚”。表面“意强”、实际“意弱”

在毛泽东留下的文字里，最早谈论自己，分析自己性格的，是1915年8月写的一篇日记。他为这篇日记起了个一目了然、近似严酷的题目，叫《自讼》，好像是自我控告一般。这篇日记是用文言写的，翻成白话，毛泽东说的意思是：

有一天，来了位客人，告诉我：知不知道一种野生的匏瓜，它的枝叶粗蔓，像杂草一样，人们都不注意它，可到秋天的时候却能长出累累硕果；相反，那些花园里的牡丹，在春天里争艳斗妍，雍容华贵，很惹人喜爱，可一旦秋至凉归，便花谢叶枯，随风飘散，一无所留。你这个莘莘学子毛泽东，在做人方面，对这两种东西，愿意效法哪一种呢？

我回答说：我愿意效法能巨下果实的匏瓜。

不料来客却说：你是这样说的，你实际上并不这样做。我看你刚刚有了点本事，就急于在众人面前表现，而且还喜欢招朋引类，号召别人。在作风上，有张扬浮嚣之气，没有沉静淡泊之心，外强中干，爱沾沾自喜。这样下去，难道不是在学牡

丹的样子吗？那是不会有成果作为的呀！可你却说愿意学匏瓜，岂不是诡辩？岂不是在糟蹋你看重的匏瓜吗？

我听了这位客人的责问，真是无言回答，羞愧得汗都出来了，出气都难受，非常沮丧，只得狼狈而退。

这篇日记里把自己“骂”得够痛快淋漓的了。不知道是真有人这样当面同他深谈进而责问过他，还是为了自省，在沉思中想像着并以文学的笔法来解剖自己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毛泽东所说的自己的这些缺点，如“浮嚣之气”，多少是存在的，他不会无端地这样妄自菲薄，这样严酷地审视自我，哪怕是在文学的想像里面。

最有力的证据，是他把这篇日记毫无保留地抄在一封信里，寄给了堪称“师兄”并交往甚深的好友萧子升。一个浅显的道理，足可说明青年毛泽东的这个“自讼”是真诚的：愿意在朋友面前表露自己当时的性格弱点，无疑比只在日记里解剖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诚实。

这事发生在 1915 年，毛泽东进一师读书的第二年。那时，他 22 岁。这期间他好像是在集中地反省自己。

7 月间，他在一封信里，曾流露出对学校的不满，认为自己“近年来所有寸进，于书本得者少，于质疑问难得者多”。由此，产生了退学的念头，11 月间，他又向大不了自己几岁的老师黎锦熙倾吐心声，说自己入学以来，由于“性不好束缚”，始终觉得学校“非读书之地，意志不自由，程度大低，侍倡太恶，有用之身，宝贵之时日，逐渐催落，以衰以逝，心中实

大悲伤”。看来，初入长沙这所有名的学校，毛泽东还不大“合群”。可能他内心的某些想法曾对他信任并尊敬的良师益友、湘潭同乡黎锦熙倾吐过，9月间，黎去北京谋职前，曾反复叮嘱他注意循规而学，谨慎从事。可仅两个月时间，尽管毛泽东“孜孜不敢叛”，但这种自我压抑，无疑更使他难以忍受，实在受不了学校的这种气氛，在这里感到简直是浪费时间，才坦率地写了这封信。他不满意这所学校的原因，大致是：

1. 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受到什么规矩的束缚，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面前，觉得意志不自由；
2. 教学程度不如自己期望的高；
3. 相互往来的“伴侣”也不好，甚至“大恶”。很明显，毛泽东当时看人评人相当苛刻，也就显得卓而下群，乃至“孤芳自赏”。

于是，他做了两件事。一件是写了一个征友的启事，张贴各校，有五六个人来应征。在这封信中，他告诉黎锦熙，这是近日唯一一件让他稍觉快慰的事情。再一件事，也是在这封信中透露的：“必欲弃去，就良图，立远志。”也就是要退学另谋他处学习。

可能是由于其他人的劝阻，毛泽东终究没有退学。不久，他当了学生会干部，干得兢兢业业，煞是认真，做了许多让师生们都说好的事情，慢慢也不再想退学的事了。

再后来，他一心扎入救世济民的大道理的探寻之中。他

觉得世上有一些人，四处说大话，滔滔不绝，一般人都把他们当“贤者”看，把他们说的话当真理来奉行。读了一些书，对照纷纭世事，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给社会开出的各种药方，都是枝微末节，没说到根本处。他觉得根本的药方是找到一种叫“大本大源”的东西。由此，反观自己，他于 1917 年 8 月给黎锦熙写信，再次袒露心迹，说自己近年言行，“亦颇有蹈此弊倾向”，下决心“今后宜戒，只将全幅工夫，向大本大源处探讨”。

想想，自己快要毕业了，可还没有得到真理，还没有确立未来的志向，对人生，对国家，对教育，采取什么主张，都“茫乎未定”。毕业以后干什么呢？他告诉黎锦熙，去教书，去办事都是下策，“自思读书为上”。其实，他毕业后，并没有时间去读书，组织新民学会的各种活动以集合群体，创办《湘江评论》投入五四运动，领导驱张运动干预湖南政局，开设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……这时候，他已经开始考虑建党的事情了。

真是忙得够呛。毛泽东似乎天生不图清静和“独善其身”。搞这些社会活动，人事间免不了有一些争论，常有不痛快的时候。就在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门槛内外，不大愿意迁就于他人的毛泽东，再一次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一些弱点。

正好，新民学会一个叫罗学赞的，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，说到人们待人处事，常常出现四种错误，一是感情用事；一是看问题以偏概全；一是不考虑事物间的因果联系，把现象当作结局；一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事实。毛泽东于 1920 年 11

月 26 日，写了封回信，作了一番自我解剖：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，均不出四者范围。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，惟感情一项，颇不能免。……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，或发现他人格上有缺点，他发出来的议论，我便有些不大信用。以人废言，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，日后务要矫正。我于后三者，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时常错误，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，所谓明知故犯罢了。

感情用事、因人废言这些性格缺点，都难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一个向上进步的团体中，应当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？

几天后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希望。在给法国的蔡和森等人的信里，他提出，新民学会的成员所应该有的人格特点是：第一要有“互助互勉”之心；第二是诚恳，不圆滑；第三是光明开朗；第四是能变化气质，有向上心。

这个时候，在长沙的两个重要的新民学会成员彭璜和易礼容之间闹起了矛盾，彭璜找毛泽东谈了一次，说到不愿意与恶人共事，这大概是对易礼容的怨怼之词。也说到要“征服”易礼容等。此外，还说自己和毛泽东相交，常常觉得毛泽东意志太强，不免引起要“反抗”的想法，云云。

1921 年：月 28 日深夜，在外奔波一天的毛泽东为调解彭璜和易礼容之间的矛盾，写了封长信。指出了彭璜身上的性格缺点，也说到自己。他说自己这两年多来，几乎把过去的修养都破坏了，“论理执极端，论人喜苛评”。

然后，一一指出了彭璜的十个缺点：“一、言语欠爽快，态度欠明决，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。二、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。三、时起猜疑，又不愿明释。四、观察批判，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，五、略有不服善之处。六、略有虚荣心。七、略有骄气。八、少自省，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。九、少条理而多大言。十、自视过高，看事过易。”

“论人喜苛评”的毛泽东也承认，以上性格缺点，除一、三两条及第五条自信所犯不多外，其余他自己“一概都有”。

也就是说，毛泽东认为自己说话办事，态度还算明朗爽快，能够择善而从。但感情用事，自视很高，责人严，虚荣骄气等等，则概莫能免。最后，毛泽东向朋友坦陈了自己过去“不好意思向人公开”的一个“最大缺点”——“意弱”。

这大概是对彭璜说毛泽东平日做事意志太强，有时强得难免刚愎自用、强加于人的一个解释。毛泽东的解释是：“我平日态度不对，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，兄或谓为意强，实则正是我意弱的表现。”

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大概就是用强悍执拗乃至咄咄逼人的待人处事方式，来掩饰自己意志脆弱和不大自信的一面。

毛泽东当然也不是无端地糟践自己，一味以贬损自己来安慰彭璜，让他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和劝说。虽然不免有讲究劝说方式这个成分在内，但太看不起自己，绝非毛泽东所为或所愿为。所以，他在信里也肯定了自己做人处事的优点：“立

志真实(有此志而已),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,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,不愿牺牲真我,不愿自己以自己为傀儡。待朋友:做事以事论,私交以私交论,做事论理论法,私交论情。”这又见出他的自信,并使自我解剖更全面得体,进而真实了。

正是明明白白地带着这些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,总想做点事情干出经国大业的毛泽东,走进了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,在这新生的一群人身上,当然都同毛泽东一样,还连挂着那个催产的时代母体的脐带……

2. 红军时期:谈陈独秀和自己。为什么向斯诺敞开心扉?

从1921年建党到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以前,毛泽东谈论自己、分析自己的言论不多。

这大概是因为:东奔西跑,事务繁杂,且千变万化,没有沉下来反思自己的环境;无论是革命的道路还是自己的经历,都曲折起伏,处于实干应急之中,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,无需多谈自己;也可能是有不少解剖自己的言论,但战事频仍,没有保留下来。

不过,在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,毛泽东有一处说到自己的材料,尽管并非专为解剖自己。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就要结束,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,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系统地谈了自己的历史。其间的跨度,正好十年。为表述方便,我们把这十年称之为“红军时期”。先说

第一个材料。

那是 1927 年在“八七”会议上的发言。谈到农民问题，毛泽东说：当我（1927 年 1 月）来到长沙之先，对党完全站在地主立场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，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。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，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。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，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，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，对中央则毫无影响。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，党的指导却不革命，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。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。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，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。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，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。

这段话表明：1. 在 1927 年 1 月以前，他对中央的决策虽不同意，但对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（主要是农民问题）还没有明确坚定的意见；2. 在湖南从事的农民运动的调查，对他形成自己的观点，起了关键作用；3. 在当时，他对中央的“领袖同志”还是很信任的，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，他没有坚持己见。

这里说的“领袖同志”，自然就是引导毛泽东走进共产党队伍的陈独秀。若干年后，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谈起陈独秀，说他那时的日子则“非常难过，睡不着觉，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，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；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，他毫无办法，找不到出路。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，又